

## 林毅夫: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经济的三个“不会改变”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1月9日在纽约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将坚持深化改革,经济将保持较高增速,中美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仍然具备良好基础。

2018年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在纽约举行,林毅夫在论坛进行主旨发言时作上述表示。他说,“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诸多领域都会发生变化,“但我今天想三个“不会改变”。

第一个“不会改变”——中国将坚持深化改革。林毅夫说,依靠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

的改革,中国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在过去约40年中,“一个奇迹”林毅夫说,中国目前的改革目标是很明确的,但实现起来需要时间,而且即使中国完成了当下所有的改革目标,也会有新情况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永远在路上,这点不会改变。

第二个“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将保持较高的增速。林毅夫说,保持经济的增长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林毅夫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途径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如

此。但发达国家由于已经具有技术和产业优势,因此需要不断发明新技术、创造新产业,成本和风险更高;而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可以学习吸收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进入已经成熟的高附加值产业。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机会降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成本和成本,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林毅夫认为,只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中国经济依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较高速增长。

第三个“不会改变”——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经贸关系仍具备良好基础。林毅夫说,中美两国经济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互补性强。中

国的制造业可以为美国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而美国高技术产业对中国来说也具有重要价值。此外,在中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长的情况下,到2050年以前,中国每年将为全球的经济增长贡献1%,为全球市场扩张贡献30%,这无疑有利于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在‘新时代’,中美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仍然有良好基础,这不会改变。”

2018年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由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和中国企业发展论坛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来自中美两国的百余位经济界人士参加论坛。(马德林)

## 分类改革逻辑下的国企混改

杨瑞龙

混改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它的核心就是国企和民企的混合,必要性就是民企有民企的优势,机制灵活,国企有国企的优势,有凭借垄断地位的市场支配势力与融资优势。

但是实践中,为什么二十多年前我们已经开始搞混改,为什么搞了二十多年没有实现改革目标?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当下把混改作为国企改革突破口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这些基本问题我们未必很清楚。

本轮混改最大特点是在分类改革的逻辑下推进混改。通过在分类改革的逻辑下推进混改,加快优化国有资产布局、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 一、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原则及分类推进混改

我们要在分类改革逻辑下探讨混改,所以必须要先把分类原则讲清楚。

所谓分类改革主要是指根据国有企业所处的行业不同,以及所提供产品性质的不同来进行分类。

根据国有企业所提供产品的性质及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特征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从行业角度来说,从竞争到垄断;纵轴从产品性质上说,从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

处于第二象限的国有企业提供的产品是公共产品,行业处在垄断行业,毫无疑问这类国有企业应选择国有国营模式;处于第三象限的国企提供的是私人产品,行业是垄断,对于这类自然垄断的国企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但国有资本占控制地位;处于第四象限的国企提供的是私人产品,行业特征是竞争的,则推进产权多元化或者非国有化。

我们应根据上述分类原则,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进行分类分层的混改。如果国企提供产品性质是公共产品,行业特征是垄断的,通常选择国有国营模式,那么是不是这个行业里就没有混改余地了呢?还是有的。

首先公共产品是一个系统,但是在一个长长的公共产品的产业链当中,产业链的末端或者分支可以进行混改。比如国防是公共类,但国防里面的某些企业是可以进行混改的。举个例子,如军人穿的军装、鞋子,没有保密性的部队营房建设,完全可以通过混改甚至是以教育、医疗、养老这样的行业,这些也有混改余地。

我们可以分为基本的非基本的公益类产

品,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老等,国有资本要控制甚至完全由国家提供。但是我们可以把非基本教育、非基本医疗、非基本养老划分出来,这个领域可以大规模推进混改甚至可以让民营资本占控制地位。

现在我们需要有条件开放医疗教育、养老市场,如果有部分基本和非基本就比较难,这里也有混改余地。

本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应该集中在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过去二十年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从名字上来看好像是垄断企业,实际上早就进行了大规模“多元化”,处于这个行业的国有企业还是要细化分类改革的原则。

首先,要有一个宏观分类概念。具体到某个特定的国企到底处在什么行业,这个一定是有一个客观标准。2015年中央22号文《中央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是挺好的一个文件,但在具体实施时提出了“谁出资、谁分类”原则,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主管的分类原则,即这个企业是垄断的或者是公益的,是由国有企业的主管方即政府说了算。

我认为这里应该有一个客观的分类标准,国外有一些非常成熟的产业划分标准,国内发改委和其他部门也有比较具体的产业细分标准,我们完全可以确定一个细分的产业目录,并明确说明该产业到底是属于竞争性产业还是非竞争性产业,然后作为一个“负面清单”向社会公示。

哪些企业是垄断的,哪些是公益的,哪些是竞争的,不是你说了算,要根据客观分类标准对号入座,这就比较好解决。

其次,还要有一个微观分类。为什么要讲微观分类呢?

过去国企凭借垄断地位向太多产业延伸了,很多企业都搞房地产、宾馆了,很多国有企业都搞医药、高科技。

很多央企其实主业处于自然垄断行业,而大量的辅业处于竞争性行业,并且常常凭借垄断地位所获得的市场支配势力与融资优势,获得在竞争性领域的竞争优势,导致事实上的“与民争利”,这也是当下民营资本投资率比较低的原因之一。

因此,在明确“微观分类”的前提下推进央企的“混改”,具体途径就是要加快央企的“主辅分离”,对于央企中处于国计民生领域的和主业处于一般性竞争领域的辅业进行“产权多元化、股份制改造,也可以由民营资本控股。

第三,本轮混改需要触及到央企的“总部”。

90年代搞的混改,一个不太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基本不触及到总部。

总部管企业、管资产、管资本,什么都管。现在我们倡导国资委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可是总部对下属公司仍然什么都管,子公司产权独立化遇到了挑战,还是无法真正实现向“管资本”转变。

为此,本轮混改应该触及到央企总部,或者进行类似以联通那样的整体混改,总部也实行国有股控股条件下的产权多元化,或者按照十九大报告中的部署,央企总部按照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模式进行改革,让央企总部成为一个追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主体,通过股权对控股子公司贯彻股东的利益,不要手伸得太长。

这样的话,下面的子公司混改就有可能达到效果。否则的话,公司总部什么都管,一竿子插到底,股权比例很大,搞来搞去还是老样子。

第四,积极创造条件,引入员工持股制度。这个意见大家比较一致。员工持股的引进,特别是垄断性企业搞混改的时候引进员工持股还要慎重。

一方面积极鼓励,另一方面,如果垄断性产业和竞争性产业混为一体的话,央企很容易在子公司引入员工持股制度,然后母公司向该子公司进行利益输送,导致不公平的改革。

我主张在引入员工持股制度之前,一定要进行央企的主辅分离,把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分开,然后可以在垄断性的主业中试行员工持股制度,否则的话又是一大堆意见。

处于竞争性行业国企推行混改就比较简单,就是要胆子更大一些,步子迈得更快一些,让市场来决定股权结构,也完全可以让民营资本控股。

## 二、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存在的若干障碍

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我们说得做得多,两年过去了,到底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说句老实话,进展不大。

混改试点我看了以后,觉得没有太多改变,大多是一个国企拉了另一个国企搞一搞,民营资本参与度“改”了没有?其实没多大改变。

现在国企混改不配套,人事、财政制度不

配套。国资委很辛苦,国资委说他们在推进,但是现在在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不完全在国资委,某些人事权在中组部,某些财权在财政部,某些投资权在发改委,某些工资权在人社部,它们之间在国企混改方面的政策并不完全配套,如果让国企负责人在混改中自己或者通过国资委去协调那些配套性的政策,确实有不少难以解决的困难。

真想搞混改,要从顶层上设计一个相互协调配合的配套性政策,减少国企混改的障碍。

尽管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混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但是目前看来国企和民企的热情好像都不高,国企混改雷声大、雨点小,一般都是国资和国资混,国有企业和民营资本混。

国企领导人担心被人戴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民企呢?入股国企以后到底有什么好处?民企跟你混,有两种目的,一种是财务投资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一种是战略投资人,追求控制权。

如果他是财务投资人,垄断性行业开放他当然愿意,但是现在没有好好开放,所以民营资本想进入也进入不了。想作为财务投资人,垄断性行业还有很多壁垒。如果民企想作为财务战略投资人,就是希望混改后民营资本有话语权,甚至能拥有控制权。

从实际情况来看民企没办法控股,一个是国有资产规模比较大,另外一些观念上也没有完全放开。这样,民企来了也享受不到垄断行业特别好处,竞争性行业也不能控股,还有可能被关闭打狗。所以国企找国企混一混就算了。

## 三、混改最主要问题是要解决改革动力问题

政协委员、中石化原董事长傅成玉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很发人深省。他说国企改革目前是“政府在忙,企业在盼,少数人在干,多数人在看,少数企业在试,多数企业在等”。

究其原因,就是改革动力不足,怕改革担责,甚至怕被人带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从而出现了国企内部“懒政”“慵政”的现象。过去四十年中国大部分成功的改革经验基本都是微观主体创造出来的,它为什么能够创造呢?具有改革动力。

现在改革动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地方政府改革动力、国企改革动力能够解决的话,一个好的文件就能够落地;如果改革动力机制不解决,一个好的文件就是难以落地。因此,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改革动力问题。

## 人大经济学院2017年秋季学期举办十期宏观经济学研讨会

2017年秋季学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成功联合举办了十期(总第226-235期)宏观经济学研讨会。至此,宏观经济学研讨会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累计举办235期。陈彦斌教授是宏观经济学研讨会的创办人和主持人,经济学院博士生刘哲希是本学期研讨会的联系人。

宏观经济学研讨会旨在通过追踪与研讨国际宏观经济领域最高水平的前沿文献,为与会者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定量宏观模型提供借鉴思路,从而推动对中国宏观经济重大问题文献的深入研究。每期研讨会由一位优秀青年学者进行点评。本学期宏观经济学研讨会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薛涧波副教授,经济学院陈朴副教授(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刘凯副教授(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陈小亮博士及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郭豫媚等多位老师作为点评人。每期研讨会的主题文献和PPT均上传至网络(www.docin.com/mydoc-88265459-1.html),以方便大家对相关文献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大宏观)也会定期发布宏观经济学研讨会的相关信息。

本期研讨会主要聚焦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效性方面的研究。郭豫媚(总第226期)主讲的文献“On the optimal inflation rate”结合资产组合理论的思想研究了货币经济学领域中最优通胀率这一经典问题。文章发现,由于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当资本的风险越大时,个体对于货币这类无风险资产的需求越强。因此,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滞后,最优通胀率也应该越高。刘凯(总第228期)主讲的文献“Banks as Secret Keep-

ers”从信息披露的角度分析银行系统与资本市场的核心区别。资本市场具有充分的信息披露和价格发现的特征,因此它能够提供更高风险性资产。而银行系统为了提供安全性资产则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保持其贷款信息的非公开。不同企业的风险特征以及市场对安全资产和风险性资产需求的权衡取舍,决定了银行融资和资本市场融资的边界。陈朴(总第229期)主讲的文献“Monetary Policy,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Incomplete Markets”通过在标准的新凯恩斯模型中引入不完全市场和有限理性假设,研究了名义刚性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不完全市场和有限理性的相互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且这种作用在长期中会更加明显。陈小亮(总第232期)主讲的文献“The Role of Automatic Stabilizers in the U.S. Business Cycle”通过构建含有财政自动稳定器和个体异质性的经济周期模型,研究了财政自动稳定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表明,降低所得税等税收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大了经济波动的幅度,向贫穷和失业人群的转移支付则能够起到显著的自动稳定器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之所以税收的自动稳定器效果不明显,是因为货币政策已经趋于最优,留给税收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的的空间不大。当货币政策面临利率零下限时,税收自动稳定器的效果将变得较为显著。周璇(总第234期)主讲的文献“Constrained Discretion and Central Bank Transparency”通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定量研究了央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对货币政策的实施和央行福利的影响。文章发现,货币政策可以在短期偏离其稳定通货膨胀的目标,而不会引起人们对通货膨胀预期的改变,因此货币政

策具有一定的相机抉择的灵活性。但是,一旦货币政策偏离目标时间增长,就会引起人们通货膨胀预期的改变,从而造成福利损失,因此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是有限的。

此外,本学期研讨会还就经济增长与周期等宏观经济领域的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刘哲希(总第227期)主讲的文献“Escaping the Great Recession”探讨了美国经济为什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陷入了经济衰退但通胀水平较为温和的局面。文章认为,这主要源于公众对未来政策不确定性预期持续,担忧过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一直持续到带来债务货币化风险,由此公众的通胀预期处于较高水平。数值模拟结果表明,这种政策不确定性在短期内会一定程度上减缓经济的衰退幅度,但在长期中会加剧经济的波动性,因此政策制定者面临着是否要增加政策不确定性的权衡。韩少华(总第230期)主讲的文献“‘What Explains the 2007-2009 Drop in Employment’ Through Research Findings, Real Estate Price Falls and the Real Estate Market”探讨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就业人数下降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在部门之间转移所遭遇的障碍与工资刚性则进一步加剧了失业问题。黄源(总第231期)主讲的文献“Financial Frictions and Fluctuations in Volatility”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约束的DSGE模型,研究发现,由于企业部门受到的生产率冲击会恶化其信贷状况,容易导致企业违约现象的发生,所以企业倾向于更加谨慎地雇佣劳动力,从而导致产出缺口和失业率的增加。这一模型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美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企业部门的信用风险分布变得更加分散。随晓芹(总第233期)主讲的文献“Slow Recoveries: A Structural Interpretation”基于新凯恩斯模型分析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缓慢复苏的原因。文章认为,相比于供给冲击和劳动力市场冲击,需求冲击是导致美国经济复苏缓慢的主因,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加大力度,从而帮助美国经济改变复苏缓慢的局面。黄源(总第235期)主讲的文献“‘Inflation Dynamics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构建了一个包含价格黏性、消费习惯与外部融资溢价的DSGE模型,研究发现,面临危机时资产状况较差的企业由于面临高额的外部融资成本,所以会选择提高销售价格,以牺牲一定的市场份额为代价换取产品销售收入的增加。这一机制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产出下滑严重,而相应的通胀水平下滑却较为温和的现象。

十年来宏观经济学研讨会的影响力持续扩大,每期研讨会都有来自人大本校、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的数十名师生参加。同时,宏观经济学研讨会培养了一批既熟知中国现实问题又与国际前沿理论接轨的高水平创新型研究人员,他们已前往剑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波士顿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等世界顶级名校攻读博士学位并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评论》、《金融研究》以及《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Applied Economics》等国际SSCI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多名优秀人才已在耶鲁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及中央财经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任教。此外,宏观经济学研讨会也向国家机关与研究机构输送了大量视野开阔、理论扎实又具有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

(陆美贺 李佩洁)

五位经济学家谈全球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

展望2018年我还是认为继续看好欧洲经济。欧洲经济复苏也是可能会超预期,这个强劲复苏我觉得会持续。日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也在明显复苏,这方面的上升我觉得非常明显。但是对最大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美国增速是上升,但是美国很多政治风险我是非常担心,特别是美国中期选举;议会如果共和党失去了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席,之后他很多政策没有办法实现。我同意刘利刚讲的,减税对美国中产阶级得利很少;对中高这一层,高于中产阶级低于富豪这一层,他们来交了波士顿、旧金山、纽约——民主党这些比较富裕的州,他们有很多减免额度下降,以及房地产房子按揭贷款下降,会有一个小小折扣额。对这些地区税收负担是加重的。这个减税对个人是非常有政治立场。所以我觉得美国最大问题是民主党、共和党越来越矛盾且无法调和。这次减税也是从来没有过,全部按照党派划分,民主党没有一个支持,共和党全部支持。如果中期选举美国出现政治上一个党、一院变成民主党天下,美国以后政治僵局会更加明显。这是我2018年继续看好欧元,我觉得美元弱势会持续。欧洲经历了脱欧考验,经历了欧债危机考验,德国经济超过2%增长,这对德国来说是高增长。欧洲复苏周期慢于美国,美国处于复苏高点了,美联储加息可能2018年是增长高点,但是欧洲还有两三年周期的复苏路径可能会走。所以我是感觉到欧洲经济复苏可能会更加坚实。中国我是感觉到,刚走也很明显,也就是我们的增速是往下走,我们一二季度高,到了第三季度在放缓。今年2018年中国最大三个政策重点一个是去杠杆,防风险,环保还有扶贫,这都是在转型,往增长质量上转。这个增长质量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使以前增长会慢下来,特别是环保。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中美贸易战。当然国际贸易,美国这样的中美贸易战,不会重新点燃这也是风险。还有一个风险是通胀,这是一个灰犀牛事件,如果通胀一旦起来,全球央行肯定是加速紧缩。这个对经济有很大影响,但是现在通胀没有发生。大家觉得这个好像不是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全球资源包括中国供给侧改革,都会使这个市场慢慢成为一个风险,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有一些观点上没有提到的。

(宗编)